

分享经济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研究了一直使西方经济学家感到非常苦恼的经济问题——停滞膨胀。作者认为，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这种工资制度下，工人的工资额是固定的，与企业的经营状况无关。资本家为支付工资成本，必然缩小生产规模，维持高价，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就工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中，确定的不再是具体的工资额，而是“分享比率”，即确定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多少归资本家所有，多少归工人所有，那么停滞膨胀将自动消失。著者将这种分配制度叫分享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经济叫分享经济。他认为分享经济是战胜停滞膨胀的有效武器。著者还就怎样从工资制度向分享制度转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本书的经济学语言浅显，凡略知西方经济学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全书的内容。

分 享 经 济

——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

〔美〕马丁·L·威茨曼著

林青松 何家成 华生译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里西街)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 16/32 印张 101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统一书号：4395·34 定价：0.85元

译者序

分享经济能战胜停滞膨胀吗？

马丁·魏茨曼生于1942年。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他的《分享经济》一书于1984年出版。该书提出的分享经济新思路近来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美国经济学界和实业界，甚至有人称赞分享经济是“自凯恩斯理论之后最卓越的经济思想”（《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85年8月26日）。加拿大经济学界的评论认为，该书的建设性意义在于：它对人们一向视为当然的经济制度提出了再评价的任务，因而是绝对值得人们普遍一读的（《加拿大经济学月刊》1985年5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分享经济》之所以成为一本喧嚣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畅销书，据说是因为著者发明的反停滞膨胀的新疫苗或给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令人头痛的滞胀病开出的新药方，“不仅见效快而且是永恒的解决方法”，注入这种疫苗，“市场经济就能荟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精华”，“资本主义就可以真正得到人们最终的欢呼”。

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分享经济。魏茨曼首先将雇员的报酬制度分为工资制度和分享制度两种模式。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经济就分为工资经济和分享经济。工资制度指的是“厂商对雇员的报酬是与某种同厂商经营甚至同厂商所做或能

做的一切无关的外在的核算单位（例如货币或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分享制度则是“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譬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

在著者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停滞膨胀正产生于工资制度这种特殊的劳动报酬模式”。他认为，任何一个厂商都面临着厂商各自特有的不确定性和厂商全体共同的不确定性。当经济运行仅仅因存在厂商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患局部感染时，工资制度对这种不确定性引起的需求结构变化的调节，堪称是灵丹妙药；然而，当经济中存在厂商共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侵害经济运行的整个机体的健康时，工资制度在对付由此引起的总需求水平的变化方面却成了一剂十足的劣药。换言之，在经济景气时显得如此重要和精巧的工资制度，一俟情况逆转，简直变成了一种该诅咒的恶魔。在他看来，在工资制度下，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成本是固定的，因而厂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时总需求变化作出的反应主要是在产品的数量方面，而不是价格方面。当总需求缩减时，厂商如果维持既定的产量水平，降低产品的价格，显然会因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而赔本。所以厂商作出的决策必然是维持既定的产品价格、削减产量，以便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这样势必造成人们的普遍失业。

著者进一步认为，停滞膨胀也“与人们对运用凯恩斯政策及其他人道措施来帮助经济不稳定时期的失业者和破产企业抱有厚望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通货膨胀倾向的基本原因是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富有同情心或心肠更软的制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选择了给它们当中的失业者以广泛的保险，而且整个民主混合经济中的市民不会长期忍受高失业率，而“当工人和雇主以为政府会帮助他们

摆脱困境因而衰退不是暂时的和温和的时候，这种信念本身就很可能把一种严重的、全面的通货膨胀癖好传递到经济中去”。因为当工资经济碰到总需求缩减时，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失业，但品尝了现代经济知识之树所结的一部分果实的全体选民却无法忍受，从而人道的充分就业政策也不能坐视失业稍许广泛的出现，这势必“使一个不允许转向通货紧缩，但可以自由转向其他方面的棘轮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结果是“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日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基于上述认识，著者惊呼，为了战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停滞膨胀，“我们需要新的手段，经济系统本身也需要有根本性的修补”。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并直接在个别厂商层次上矫正根本的结构缺陷”。他认为“只要政策选择继续限制在传统的财政货币总政策的范围，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停滞膨胀”，因为当今的主要经济问题，从本质上看不是宏观的问题，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工资经济在宏观上造成滞胀的根源在于它在微观上引起的顾客受到的礼遇明显是高于工人这种不对称的人际关系，所以，“在纯宏观管理的玄虚高空上是不可能战胜滞胀的，相反必须在根本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泥泞深沟中以斗争的方式才能战胜它”。因此，“现在到了采用分享经济这种天然武器来直接对付滞胀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愚蠢地运用那种不可靠的宏观措施来旁敲侧击地对付滞胀了”。在著者看来，“所需要的工资改革的性质并不十分复杂，基本做法是把工资制度改变为分享制度”，即把“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应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这样，工人与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达成的不再是具体规定每工作小时工资这种合同，而是确定了工人与资本家在厂商收入中各占多少这种分享

比率的协议。

著者断定，“战胜滞胀的主要秘诀就在应用分享制度于正常的宏观经济效能的巨大优越性”，分享制度“不仅保存了分散决策的固有的灵活性的优点，而且它可能成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天然死敌”。因为，（1）分享制度与工资制度具有根本不同的动态特点。从长期来看，抽象掉失业、各种干扰波动以及不均衡轨迹位置的最终影响，这两种制度都趋向于同样的长期均衡。但是，就短期而言，当合同签订以后，分享制度意味着：当更多的人被解雇时，工人的报酬自动增长，当更多工人受雇时则相应下降。相反，在工资制度下，一个在业工人的收入不受劳动的聘用或解雇的直接影响”，这种差别的产生，是因为在工资制度中，对厂商来说，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雇用一个额外单位劳动的边际成本。而在分享经济中，劳动的边际成本总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正因如此，实行分享制度的企业“天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2）虽然分享制度受到干扰时，偏离均衡的程度并不亚于工资制度，但重要的是，并不在于一种制度的运行比另一种更接近于均衡，而在于它对不均衡反馈方式的差别。分享经济比之工资经济所具有的另一特点“在于它偏离均衡时具有更强的返回均衡的倾向”，因为工资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仅仅以微弱的矫正力缓慢地改变工资这种粘着性较强的经济参数；而在分享经济中，对劳动额外需求的直接强作用力形成导向充分就业的强劲势头，甚至当分享系数普遍不适当时，也仍能使整个经济保持充分就业。

（3）“分享经济比工资经济具有更小的通货膨胀倾向”，因为在分享经济中，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这种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或者说，由于提高价格对企业来说是件代价昂贵的事，“所以分

享经济是有内在地反通货膨胀的倾向”。不仅如此，“就分享制度无论如何都有助于吸收失业劳动者而言，它给政府稳定币值以更大的自由，更不必过多担心这样做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反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因此，作为工资制度中的常客——通货膨胀，“在分享经济内部简直毫无立足之处”。（4）分享经济除了是有根治停滞膨胀的宏观效应外，还具有矫正不对称的人际关系微观效应，因为在分享制度这种劳动短缺经济中，“自身利益的驱动将会引导分享经济的厂商象在商品市场上对待顾客那样也在劳动市场上为工人奉献一套非价格竞争的圣装”，“分享经济具有一种不屈不挠地吸收失业工人、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内在冲动，而且除非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冲动不会停止，甚至就在这时，分享经济仍然象一台没有熄灭的发动机，试图在充分就业的循环上自觉启动”。

怎样才能从现行的工资制度转向分享制度呢？著者着重指出，“如果仅仅一个企业单独从工资制度转向同等的分享制度，这个企业的产量和就业量会增加，价格和人均收入会降低，每个工人的报酬也会减少”，因而是行不通的。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全部（或相当多数）的企业转为分享制度，经济会产生平衡扩张效应”。因为来自新就业的工人的消费促使需求增长，这反馈过去，使得价格、人均收益、劳动报酬趋向稳定，整个经济会自动地朝着更高的就业水平挺进。著者最后指出，为了实行工资经济向分享经济的一揽子转换，首先要利用舆论工具，使分享制度给社会带来的良好宏观经济效果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应当制定一个全国性计划，从社会意识、教育和信息等多方面入手，以便把社会责任感注入劳资的集体协议过程中，使工会、公司和普通公民都了解采用分享制的目的

和采用工资制的危害。建立专门的咨询服务机构，并配备专家解释两种报酬制度的优劣，造成赞扬分享制反对工资制的社会气氛。其次运用宏观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实行分享制度。他建议将劳动收入分成两个部分：工资收入和分享收入。对这两个部分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对分享收入予以减税。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的分享制度实施机构，由它来制定分享制度的标准。

著者特别提到这种改革不是强制性的。分享制度不是政府强加给企业的，而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创造的。没有人命令厂商或工会如何确定分享比率，也没有人强制每一个厂商实行分享制度。政府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对分享收入予以减税。

以上就是魏茨曼提出的分享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及主要政策主张。应当肯定，分享经济中有些内容对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理论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对策是富有参考价值的。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方面，他对工资制度及劳动力市场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在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在驱使人们进行工作、生产商品和赚取收入，以便享受得起需要花钱的东西方面”是不如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时还是非常丢脸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阶级，在失业的陷井里，从寻找工作到工作环境上所受到的不平等礼遇和虐待，以及在长期通货膨胀的泥坑中所受到的折磨，因此，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些困难，必须“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最终必须对经济机制作根本性的改革。的确，在个别厂商中实行分享制度，工人的工作环境可能有所改善，个人收入可能也会提高，这会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更多利润的前提下刺激资本家，扩大生产。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著者对分享制度在帮助资本主义经济改善微观结构方面的缺陷，从而摆脱宏观方面的滞胀困境上所寄于的厚望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第一，著者认为停滞膨胀的根源在于劳动报酬制度采取了工资支付的形式，因而他试图用分享经济来医治滞胀。其实，试图从分配角度入手来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十九世纪杜林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7页）。对此，马克思指出：“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9页）。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报酬采取工资支付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即便按照著者的看法，滞胀也只是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出现，那么，为什么具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工资制度直到现在才造成滞胀呢？显然，把工资制度诊断为滞胀病的病因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处方当然也就不能对症下药。第二，著者把工资的变动即厂商劳动成本的变动看成是具有充分弹性的，这是他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他的理论中，正是这种充分弹性使劳动成本总能不断下降，造成厂商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从而造成充分就业。其实，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这个劳动力价格的表现形式是受劳动力价值这个内容支配的，工资变化服从的是劳动力价值规律，由于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时期内劳动力价值是一定的，因而，在现定期限内，工资变动的弹性是十分有限的。由此可见，建立在工资具有充分弹性这种谬论之上的分享经济，是根本无法使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的。最后，著者除了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归结为工资制度具有更强的通货膨胀倾向外，还认为通货膨胀

的原因与资本主义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帮助失业者，从而资本主义的心肠变得更软有关。说采用凯恩斯主义不能挽救资本主义是对的，但认为采用凯恩斯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在剥削工人方面的心肠变得更软，则纯属无稽之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对工人剥削的加深，从而造成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对抗的加剧，正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因此，想要通过硬化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心肠来消除通货膨胀，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对策方面，著者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就业及收入平等方面具有优越性，并对社会主义经济传统模式中的卖方市场进行了辛辣的批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批判及提出的从工资经济向分享经济转换的政策建议，给我们的工资改革及整个经济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如果说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缺乏全社会利益一致的基础，因而分享制度的改革难以起步，或即便出了台也难以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根本弊病，那么，在分配领域中推行分享制度的改革却可能为社会主义工资改革提供思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特别是存在着企业内部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利益协调的利益结构，在这种利益格局下，分配制度的改革，由于具有坚实的所有制前提，倒确实可望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制度的设想，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2）经济运行中宏观功能的紊乱，往往是因为微观机制出了故障，因此，在对付宏观经济的困难方面，务必不能忽视甚至偏离其微观的结构，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

（3）应当在整体上同步推出经济改革，如果只在局部进行，往往难于出台，甚至会得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因此，经济改革除了要在时间上考虑配套外，还需要在空间上进行配套。

(4) 在业已分散决策的经济活动部分,运用经济手段推进微观经济方面的改革或完善已经出台了改革,往往比直接运用行政手段还要有效和平稳,但必须要有舆论宣传工作加以配合。

总之,《分享经济》的中译本(副标题“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为译者所加)述语浅显,立意新颖,方法别致,篇幅精短,不失为人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别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一本富有吸引力的参考书。

林青松

序 言

由于我确信本书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我已经尽可能使它通俗易懂，以便拥有众多的读者。如果我们不想在停滞膨胀中生活，我们就不必在停滞膨胀中生活。本书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分享经济就是战胜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有兴趣的读者，只要具有经济学基础知识，就能掌握书中阐述的分享经济的基本原理，甚至一些细节。对于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很快就会领略到。第七章到第九章所包含的独到见解，即任何一种补偿制度都具有必然的宏观外部经济效果。此外，我认为贯穿于全书的叙述方法、证明方法以及强调的重点也与众不同，同时还具有专业经济学的趣味。

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主题目前所处的混乱和争论状态，在经济学界是颇为罕见的。本书并不是想平息这场风波，只不过想给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注入一些生气和活力。同时，本书想通过实例来证明现在的经济理论对关键问题的分析并没有错。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一些同事的热情帮助，虽然他们的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在此特别需要感谢詹姆斯·S·厄利、伊夫西·D·多马、乔恩·科恩、詹姆斯·E·米德、蒂博·斯西托夫斯基、约翰·罗梅、英斯特·C·瑟罗、梅文·金、卡尔·卢德雷、特苏内·斯坦费·布雷斯特玛林达。

本书的写作还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几个研究生的帮助。他们是，迈克尔·库尔文、爱德多·博雷斯坦、克里斯廷·鲁

玛、马克·比斯。全国科学基金会也给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

本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还有幸得到迈克尔·阿罗森和乔伊斯·贝奇曼的帮助，由于他们的大力合作，修改书稿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多罗西及女儿罗蒂凯。在我写作时，我不能陪伴她们，使她们不得不忍受寂寞，以及生活在凌乱不堪的环境中。希望我的妻子能喜欢这本书，我的女儿在看到书中出现她的名字后能有所宽慰。

马丁·L·魏茨曼

目 录

译者序

序 言

第一章 一条更好的道路..... (1)

第二章 企业的三种主要决策..... (8)

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协调..... (19)

第四章 处于变化状态中的工资制度..... (31)

第五章 凯恩斯与工资争论..... (39)

第六章 扎下根来的不速之客..... (47)

第七章 回到基础中去..... (58)

第八章 分享经济的生命力..... (76)

第九章 具有反滞胀免疫力的资本主义..... (98)

第十章 这切合实际吗? (112)

附注 (116)

第一章 一条更好的道路

长期以来，持续的失业和缓慢的经济增长严重地困扰着市场经济。政府遵循凯恩斯的理论学会了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经济萧条。这种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5～1965的二十年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近二十年来，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日益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现在，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周期交替出现，并且经常同时发生。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破坏经济正常运行的原因。人们对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原因不甚了了。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状况也许与人们对于运用凯恩斯政策和其他人道措施来帮助经济不稳定时期的失业者和破产企业抱有厚望有关。对于令人头痛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结合，人们给了一个同样令人不愉快的名称：停滞膨胀^①。

停滞膨胀是一种特别难医治的疾病，因为医治这种疾病的宏观措施在减轻它的一种症状时会加重它的另一种症状。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是降低失业率和加快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但这种政策却会使通货膨胀势头发展到难于控制的地步。不幸的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紧缩性政策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失业增加、增长缓慢、生产率降低、预算赤字、债务危机和外贸入超，结果造成一种“政治性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混合经济国家，政策通常是前后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全体选民两极分化，并妨碍社

会有效地解决根本的现实问题。不论怎样估价，停滞膨胀都具有十分严重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我们需要新的手段，经济系统本身也需要有根本性的修补，这一点现在似乎很清楚。

这本书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为了保证适当的价格稳定和适当的充分就业的一致性，需要根本改变雇员报酬制度（employee-compensation arrangements）。只要政策的选择继续限制在通常采用的那些财政货币总政策的范围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停滞膨胀。因此，战胜停滞膨胀的方法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宏观管理办法的范围。

我们当今的主要经济问题，从本质上看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在纯宏观管理的玄虚的高空上是不可能战胜停滞膨胀的，相反必须在根本的微观经济改革的泥泞深沟中以斗争的方式才能战胜它。当务之急是改善刺激结构，以便诱导厂商进行更好的产出、就业和定价的决策。

停滞膨胀不是自由竞争的私人企业本身固有的特征。确切地说，它产生于一种特殊的劳动支付方式，即厂商对雇员的报酬是与某种外在的核算单位（典型的代表是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而这种核算单位的价值既与厂商的经营状况无关，又与厂商所做或所能做的一切无关。滞胀就是这种工资支付制度的不幸后果。这种后果有时可能靠好的运气或明智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抵销，但最终必须对经济机制作根本性的改革。

停滞膨胀的最终解决需要通过改变劳动报酬的性质来触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并直接在个别厂商一级矫正根本的结构缺陷。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制度，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譬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现在到了采用这种

“天然的武器”来直接对待停滞膨胀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愚蠢地运用那种不可靠的宏观措施来旁敲侧击地对付停滞膨胀，因为这些宏观政策充其量只是使失业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

所需要的工资改革的性质并不十分复杂。基本做法是把工资制度（其根本特征是任何时候都很少或没有就业空缺）改变为分享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始终存在着大量就业空缺）。这两种制度具有根本不同的动态特点。战胜滞胀的主要秘诀就在利用分享制度对于正常的宏观经济效能的巨大优越性。

为了使读者集中注意力（可能会过分简单化），现在就举一个我所能想到的十分理想的具体例子。

假设通用汽车公司平均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加上各种小额优惠是24美元，这就是说，追加1小时的劳动成本是24美元。这追加的一小时劳动是用于生产汽车，然后销售出去以增加收入。如果新增的收入超过新增的成本，那么将会雇用新工人，反之，则会解雇工人。通用汽车公司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因此该公司雇用或解雇工人的尺度是那一小时追加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是否等于追加成本。在上述例子中是24美元（每小时劳动的平均收入当然高于24美元，譬如说是36美元，这样才能支付间接费用、资本、利润等等）。

上述事例到目前为止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现在进一步假定汽车工人联合会决定签署一项非正统的劳动合同。汽车工人联合会和通用汽车公司同意该公司50万个雇员中每人分享公司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的份额，而不是规定每个工人每小时工资24美元。实际上，汽车工人联合会同意把该公司的收入分成两份，其中三分之二归劳动所得，三分之一归管理所得（在这个例子中，通用汽车公司每小时的收入总额是1,800万美元，即 $36 \times 500,000$ 美元，其中劳动所得为1,200万美元，即 $24 \times$